

“两矿”发现前 开普殖民地奴隶制生产关系剖析^{*}

孙红旗

内容提要 从 1652 年荷兰殖民者踏上好望角的土地到 20 世纪初，南非是以开普殖民地的名义而存在的。在“两矿”启动南非的工业革命之前，开普殖民地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最初是由于缺少从事农业的白人劳动力，本土化了的殖民者阿非利卡人“被迫”间接地从非洲与荷属殖民地的其他地区购买奴隶；随着殖民者向内地扩张和牧业经济成分的相应增加，掠夺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为奴成了阿非利卡人合乎逻辑的职业；当然，在此期间，白人，包括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样，尽管没有北美洲那样的大种植园，但嫁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的近代奴隶制同样在南非扎下根，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金刚石和黄金的开采迫使南非的主要劳动力进入矿场。

关键词 南非 开普殖民地 阿非利卡人 奴隶制 生产关系

作者简介 孙红旗，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州 221116）。

17 世纪下半叶，荷兰殖民者到达好望角，在南非的桌湾登陆，随后建立了开普殖民地，直到 1910 年南非联邦成立。关于开普殖民地生产关系的性质，史学界尚无专文论述。笔者认为，在两矿¹发现之前，开普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属于奴隶制性质，只不过它不是古典的奴隶制，而是嫁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现代奴隶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这既包括掠夺者的生产方式，也包括被掠夺者的生产方式，两者互动构成了开普殖民地独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开普殖民地最初存在的基础

开普殖民地的建立，本是为了给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过好望角的船只提供补给，但作为 17 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载体，追逐利润的荷兰殖民者注定要不断向南非内地扩张。而就在他们扩张的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殖民者——阿非利卡人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棘手的问题——劳动力供应问题。尽管荷兰人是欧洲出了名的园艺师——其别名“布尔人”（Boer）在荷兰语中即“农夫”之意，但他们占有的广袤土地远远超出自身劳作的的能力，自始他们就被人手不足所困扰。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作祟，遂使商业资本主义披上了奴隶制的外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的阶段性成果。

¹ “两矿”即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分别发现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期。“两矿”的发现给南非的生产关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

恩格斯指出：“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¹

开普殖民地的劳动力成分是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开普总督范·里贝克（Van Riebeeck）决定的，而他们决策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商业经营和利润的原则。当初范·里贝克从荷兰带来的第一批殖民者人数太少，根本无法经营逐渐扩大的地盘，而这些从宗主国各地招募来的散漫成性的士兵和水手，实际上也不能胜任日益发展的农业。因此，在开普落脚3年后，范·里贝克建议公司从荷兰移民到好望角。他认为，桌湾可以容纳1000户人家，新移民完全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成家立业。但他企望中的来自祖国的移民并没有源源而来，他不得不另作打算：“如果能用奴隶代替公司雇员去种地、捕海豹和从事其他劳役，每餐只给够吃的一份大米饭、鱼或海豹肉和企鹅肉，不付工钱，这一定要便宜得多了。奴隶和大米都可以廉价地从马达加斯加运来。如果这么办，荷兰只须负责防务就行了。”^④

以后几年里，尽管东印度公司不批准范·里贝克的正式贩运奴隶的请求，他还是从过往船舶买进了十几名奴隶。1658年3月，荷兰帆船“阿美斯福特”（Amersfort）号驶进桌湾。它从几内亚海岸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奴隶船，掳掠了半船黑奴。许多黑奴在中途死亡，但还有170多人活着被送上岸，大多数是小伙子和姑娘。^④于是，开普殖民地开始了推行奴隶制的第一步。同年5月，又有一艘贩奴船“哈塞尔特”（Hasselt）号从几内亚运来271名奴隶，其中228名登上了南非海岸，被殖民者以每名付价100荷币盾赎购。^④尽管不断发生奴隶逃跑事件，但由于使用奴隶的制度深受自由民的欢迎，范·里贝克亲自派2艘三桅帆船到西非的奴隶海岸取得奴隶补给。他甚至不止一次想到要输入勤劳和善于农耕及熟谙其他技艺的中国劳工到开普来为殖民地的开发效力。^⑤

由于财政原因，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任何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自从1658年14名公司雇员举行了反对公司垄断农产品价格的抗议行动后，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就商定再也不向开普移民了。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经济上节俭的原因。1716年，为了使殖民地摆脱财政赤字，公司董事会给开普殖民地新总督德夏方内斯（De Chavonnes 1714-1724）发出一封长信，询问殖民地在当时只有2000名人手的情况下能否扩大农业生产，是白人移民还是黑人奴隶比较适合于达到这个目的？已初步尝到奴隶制甜头的殖民地的回答：不是白人移民，而是黑人奴隶。他们列举了精确数字向公司说明，养活一个奴隶一年充其量只须花费60荷兰盾，而付给一个白人雇员的薪水至少是此数目的3倍。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采纳了开普殖民地官员的意见：限制白人移民，继续实行奴隶制。于是南非的道路就这样决定了。17世纪，涌向北美的欧洲移民和难民多达25万人，^④而18世纪初到达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包括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在内仅有2000人左右。^⑥整整一个世纪，好望角没有接纳新移民和输入新思想。当欧洲和美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时，南非布尔人移民区还陷在奴隶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泥潭中。使用奴隶的经历或经验确立了南非的劳动关系模式，奴隶来自荷属海外帝国的其他部分和非洲的其他地区，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来亚、锡兰、印度、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1771年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为1756人，拥有奴隶1781人；1778年布尔人拥有奴隶11107人。在“两矿”发现前，南非可以说是奴隶制国家——到18世纪末奴隶人数已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1页。

^④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Commander Van Riebeeck, in Donald M. Oodick, ed.,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ng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Amsterdam, 1960), pp. 46-47.

^④ See Donald M. Oodick, op. cit., pp. 122-123.

^④ Ibid., p. 125.

^⑤ See Ibid., pp. 3-11.

^④ 黄绍湘著：《美国史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⑥ L.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Yale University, 1990, p. 35.

达 2.5 万以上，超过了白人殖民者的人数。¹

表 1 18 世纪初期和中后期部分地区拥有奴隶的自由民比例表 (%)

年份 \ 地区	开普	斯泰伦博什	德拉肯斯泰因	斯韦伦丹
1701	69	22	9	-
1750	60	14	21	5
1773	55	11	26	7

Source: Richard Elphick and Hermann Giliemeed, *The Shaping of South African Society, 1652-1840*, Maskew Miller Longman (Pty) Ltd., Cape Town, 1989, p. 134.

表 2 1834 年废奴法令正式生效后各地区拥有奴隶数量和比例表

地区名称	奴隶数量 (人)	在殖民地的百分比 (%)
开普敦和开普地区	10 343	28.6
斯泰伦博什和伍斯特	14 365	39.7
斯韦伦丹和乔治	5 661	15.7
赫拉夫里内特	2 809	7.8
埃滕哈赫、阿尔巴尼和萨默塞特	2 981	8.2

Source: Richard Elphick and Hermann Giliemeed, *op. cit.*, p. 135.

1743 年，荷属东印度总督巴隆·范·伊姆霍夫 (van Imhoff) 在访问其管辖的开普殖民地时，看到奴隶多于自由民的情形，认为“如果我们在建立这个殖民地时便带来了大量欧洲人，让饥饿和欲望迫使他们劳动，那就会好得多。可是现在却输入奴隶，而每个下贱的欧洲人却以主人自居，要别人伺候，而不想劳动。此外，这块土地上的多数农民事实上并不是农民，而是庄园主。其中许多人认为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是耻辱。”^④

开普殖民地扩张的动力

从地理范围来看，奴隶的使用最初只限于沿海适合耕作的地区，也就是限于农业领域。随着科伊桑人^⑤被征服和大批布尔农场主涌入内地，以及经济生活中牧业成分的增大，奴隶的使用呈现渐少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从海外进口奴隶价格昂贵和进口的黑人奴隶不谙放牧。这样，牧业的全部劳动就“顺乎自然”地由本来就靠放牧为生的科伊人承当。由于布尔人的经济结构和非洲人基本相似，除非剥夺对方的土地，吸引不了非洲劳动力，布尔人抢夺的土地面积越大，就越需要将本地牧人转为布尔人服务。在完全役使科伊人之前，布尔人已经屠戮和役使了大批萨恩人，由于萨恩人基本上还处于狩猎阶段，并没有多少劳动力价值，因此，布尔人主要是强占萨恩人的地盘，把他们当做野兽来追捕、剿杀。一般情况下，布尔人民团遇见萨恩人成年男女格杀勿论，只是把儿童抓回农场当做童奴。1774 年，开普当局曾下令把捕获的萨恩人按比例分给贫穷的白人民居为奴隶。被抢来的童奴长大后名义上称为“学徒”，实际上是奴隶。布尔人牧业生产的任何扩大，都是以侵占当地非洲人的土地和掠夺他们的劳动力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征服者紧接着要做的总是把人也占有。”^⑥ 布尔人农牧场主对科伊人的占有，是这方面十分突出的例子。然而，只要科伊人还保持着足够的牧场和完整的村社组织，还有对抗入侵者的手段，布尔人既不可能实现对牲畜和

¹ R. Gra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London, 1975, p. 448; L.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Yale University, 1990, p. 35. 亦可参见杨人楩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20 页。

^④ M. W. Ikin and L. Tho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p. 110.

^⑤ 科伊桑人 (Khoisans) 为南非最早的居民，又可细分为科伊人 (有的史书称他们为霍屯督人，“Hottentot”) 和桑人 (或译为萨恩人，或布须曼人，“Bushman”)，前者的生产力水平略高于后者。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891 页。

土地的占有，也不可能实现“对人的占有”。因此，在土地扩张的道路上，布尔人对和自己相似的科伊人的牧业经济结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村社组织，总是给以彻底地摧毁，但除了遭到强烈抵抗而进行凶残的报复外，布尔人一般并不把科伊人全部消灭或赶走，如同北美殖民者早期对待印第安人那样，而是把大部分科伊人融入布尔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当然他们绝不会让科伊人成为白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而是纯粹让科伊人作为牧奴，这样，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分工，靠贬抑全体科伊人的社会地位来抬高布尔人，使每个布尔人都上升到农场主和奴隶主的地位。科伊人曾对布尔人的掳掠行为和计划进行了英勇抵抗，1659~1660年和1673~1677年，科伊人在其酋长领导下同布尔人进行了两次“霍屯督战争”，一度给布尔人农场主造成沉重的打击，但布尔人凭借其惯用的火器、牛车和马匹，赢得战争的胜利，结果科伊人的土地和牲畜大都落入布尔人之手。¹

到18世纪上半叶，一部分科伊人在殖民者的驱迫下向东迁徙，与班图黑人的一支科萨人（“Khosas”，或“Xhosas”）融合。另一部分经过和白人的几代混血，已失去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他们渡过奥兰治河，成为著名的格里夸人，操阿非利卡语，过着畜牧生活。在开普地区幸存下来的科伊人，原有的社会组织早已荡然无存，被迫栖身于布尔人农场，沦为“卑贱的奴仆”。到19世纪初，南非境内的科伊人只剩下2万。^④绝大部分科伊人跟随主人居住在农场内，全家为农场主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动：成年男性为布尔人照看牲畜，妻子在主人家当女佣，孩子兼做帮手。

列宁指出：“把千百万人赶到雇佣大军中去的那种力量，就是饥饿。”^⑤布尔人农场主把那些失去原有社会组织的科伊人变成自己农场上的永久劳动力，主要是靠超经济强制手段，把“主仆关系”的枷锁强行套在失去生计的科伊人身上，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科伊“仆役”（servant）不得随意离开农场主人，布尔人农场主可以擅自审讯和体罚仆役。失去人身自由的科伊人实际上处于奴隶或农（牧）奴的地位，除了在法律上他们还不许被随便买卖外，他们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18世纪末，英国占据了开普，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改变这块殖民地的生产关系。1807年以后，英国宣布在帝国范围内禁止奴隶贸易，这一禁令断绝了开普殖民地奴隶的外部来源，从此，布尔人开始想方设法把科伊人和当地班图人变作奴隶。非洲人既已被征服，被宣布为异教徒、野蛮人，很容易被变成欧洲人的奴隶，尽管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法律都禁止奴役科伊人。科伊人被认为只具有仆人的一点价值，更多地被当做野兽而非人类。^⅔甚至奴隶也瞧不起科伊人，把他们看做低人一等的贱役。^½科伊人住在奴隶草棚里，和奴隶同吃一锅饭，白天与奴隶一起劳动。除了名义，他们实际上是奴隶劳动的辅助力量，是南非劳动制度从奴隶制到契约奴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指出，在废除奴隶制前，正如科伊人被当做奴隶一样，在废除奴隶制后，自由奴隶被当做科伊人一样对待。作为一种选择，用有色人劳动力代替奴隶已经是一种正在运行的选择。从前怎么对待科伊人，现在就怎么对待（释放了的）奴隶。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的道路是铺在科伊人被折断了的脊背上。^¾

在1834年英国最终宣布废除奴隶制前，英国人使用部分科伊人当警察和屯边的士卒，但并没有认真改善科伊人的奴隶地位，相反，他们屈服于布尔人农场主的压力，于1809年颁布了《霍屯督法令》（即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它剥夺了科伊人到处流浪的自由。法令规定，每个科伊人都须有“固定的住所”，未经地方政府批准一律不得擅自离开，凡外出替主人办事或从事法定营生的人都须

¹ See Shula Marks,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 1, 1972.

^④ M. Maaij,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Johannesburg, 1957, p. 61.

^⑤ 列宁：《一个发现》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3页。

^⅔ See Thomas Pringle,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61, p. 237.

^½ See Bernard Makhoswe Magub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9, p. 29.

^¾ See Robert Ross, Cape of Toments: Slavery and Resistance in South Africa, London, 1983, p. 52.

随身携带通行证，违者“概以无业游民论处”¹。当时英国的大批移民还没有到来，开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少量的英国移民到南非后也如同以前的荷兰和法国移民一样，在边疆的自然环境中，很快变成利用奴隶劳动经营粗放牧业的农场主，因此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上，他们并没有质的区别，都要靠土地扩张和奴役非洲劳动力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812年，英国人又颁布了关于“学徒制”的法令，作为对《通行证法》的补充。法令规定：布尔农场主可以将在其农场上出生的年满8岁的科伊儿童收养为“学徒”，直到他年满18岁为止。《通行证法》和“学徒奴隶制”成为后来南非广泛实行的种族歧视法令的范本，为日趋严酷的种族主义立法打下了根基。后来英国人废除了这两项法令，但布尔人在其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两项法令，给每个非洲男子的脖子挂上金属牌或木牌作为身份标志，无此种标志者一律被当做流浪汉逮捕，或移交给布尔人农场罚做无偿劳工。大迁徙后纳塔利亚共和国法律规定，凡在战争中掳获的儿童均由军事长官分配给农场主做“学徒”。这大大助长了布尔人农场主劫掠非洲儿童的行为。

开普殖民地发展方向的改变

英国的开普殖民地总督查尔斯·索默塞特于1814年宣布：“这个殖民地的奴隶是唯一有价值的财产。土地与奴隶相比，土地则微不足道。”^④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⑤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就是他生存的源泉——土地被无情地剥夺。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相配合，或者独自出击，与科萨人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卡弗尔战争”（the Kaffir wars）^⅔，最终将绝大部分科萨人赶进了保留地，使他们成为欧洲白人的劳动力源泉。

必须指出，布尔人遇到的科萨人社会组织程度远远高于科伊桑人，数量也远比科伊桑人多得多，因此，他们未能像在开普西部剿灭科伊桑人那样轻而易举地剿灭科萨人，在40年里，他们没能跨越大鱼河一步，最终不得不改变扩张的方向，由东向北朝奥兰治河一带扩展。在英国人介入“卡弗尔战争”后，科萨人的抵抗力量急转直下。一个非洲老人说：“布尔人像水牛，他们有硬的头，但我们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即可看见他们。而英国人像老虎，他们头脑里东西太多；他们在我们看到他们之前就扑向我们。”^⅔

1806~1906年，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以一系列不间断的战争为特征。英国人认为唯一真正有效地使科萨人完全依赖的方法是“烧毁他的茅屋和村庄，驱走他的牲畜，毁掉他的谷物和其他食物，简言之，摧毁他的国家”^⅔。每次战争都有大片班图黑人的土地被剥夺，每次战争都有一些班图黑人沦为殖民者的劳工。

到1857年，走投无路的科萨人在绝望中将命运交给了冥冥上苍，根据部落邪教式预言家所得到的训示，以畜牧为生的科萨民族宰杀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牲畜，结果这一“民族自杀”行动使科萨人口从10.5万锐减到3.7万，^⑥余下的科萨人在饥寒交迫中回过头来，进入白人的农牧场里，成为非洲

¹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V, p. 359.

^④ L. C. A. 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Overseas Empire* Vol ④ London 1936 p 315.

^⑤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根据德文第一卷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页脚注。

^⅔ 卡弗尔（kaffir），原意为“异教徒”，此处指非洲原住民。“卡弗尔战争”的前三次主要是在布尔人和科萨人之间进行，第四次为英布联合对付非洲人，其后的5次主要是英国人和黑人之间发生的战争。

^⅔ Bernard Makhoswe M agub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9 p. 56.

^⅔ *Ibid.*, p. 38

^⑥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ntu Areas withi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U. G. 61/1955 The Government Printer, Pretoria, p. 8.

班图人中第一批遭受白人奴役的雇工。1834年，为白人殖民者役使的非洲人还很少，但到1858年，已经有3.3万多名来自特兰斯凯的非洲人在殖民地工作，且以工资劳动为收入来源。¹

殖民总督厄尔·格雷（Earl Grey）1880年说，两件事情特别重要：一是为白人殖民者提供占有土著部落拥有的土地的便利；二是卡弗尔人口应该被作为尽可能的大量而便宜的劳动力供应。^④

除了早期布尔人屠杀对他们用处不大的萨恩人外，纵观布尔人和英国人对科伊人和班图人的战争，不是一方把另一方推进沙漠或赶下大海的战争，而是一方剥夺另一方土地使其沦为附属劳动力的战争，是确立双方主仆关系的战争。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南非的高额利润除了在于它的金刚石矿和金矿含量丰富外，还在于它的极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从发现矿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种可变资本几乎以不变的价格被粗放地使用，正如在农业中劳动力被粗放地使用一样。“在这里体现为剩余产品的劳动者的全部剩余劳动，都直接被全部生产工具（其中包括土地，在原始奴隶制度形式下也包括直接生产者本身）的所有者所榨取。”^④

在南非联邦成立之前，英国人一直把南非当做殖民地看待的，他们在南非扩张土地和奴役非洲人的原则没有也不会改变，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却有阶段性的变化。在19世纪20年代前，他们和布尔人没有多大区别，但随着大批英国移民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南非的扩展而有所改变，特别是在19世纪60~80年代金刚石和黄金矿藏相继被发现后，这和布尔人一贯的信条和具体做法渐渐产生了严重冲突。英布战争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白人民族在剥夺黑人和有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并最终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

结 语

南非历史学家G.D.舒尔茨写道：在开普殖民地，“过去三百年中，从未有足够的白人从事各种份内的工作。相反，他们越来越依赖非白人去做。”^{1/4}“两矿”发现之前南非开普殖民地独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有其内在逻辑。阿非利卡人是本土化了的殖民者，他们从母国移植过来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南非的土壤和气候，而作为一个寄生民族，他们完全依赖当地的劳动力，这种生产关系和当时的世界市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在南非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嫁接奴隶制”。除了最初进口部分奴隶外，南非之所以基本上没有参与持续了将近四百年大西洋奴隶贸易，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都为布尔人的奴隶制经济所占有，成为布尔人牧农混合经济的无偿劳动力。基韦特指出，开普奴隶制是非企业性经济生活的体现，它既是开普贫穷的原因，也是开普贫穷的结果。^{1/2}南非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1/4}。随着19世纪60~80年代矿业革命的到来，“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但严格说来，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真正的奴隶制的结束应该是在种族隔离制度解体之后。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成 红）

¹ Bernard M akhosewe M agubane, op. cit., p. 42.

^④ See ibid. p. 71.

^④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6页。

^{1/4} 转引自 [德国] 亨·耶内克著；赵振权译：《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1/2} See De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1941, p. 22.

^{1/4} 恩格斯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King Pahlawi of Iran

Fan Hongda

pp. 44– 50

Iran's King Pahlawi was a key figure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close relation between Iran and U.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later 1970s King Pahlawi's autocracy fell into serious crisis. When Carter came into the White House in 1977, he didn't realize the bad situation in Iran, so he still regarded King Pahlawi as U.S.'s sole leader to star-

bilize Iran's situation there. With the deepening of Iran's crisis, King Pahlawi seemed to lose his power, there happened fierce disputes inside Carter Administration on how to deal with King Pahlawi, and they watched the collapse of King Pahlawi without going to the rescue, and this led to the end of 30 years' close relation between U.S. and Iran.

Rethinking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Kenya in the Early of 2008

Gao Jinyuan

pp. 51– 57

The incident that touched off Kenya's political crisis in early 2008 was that the "Orange Democracy Movement" led by Odinga who expressed strong disagreement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National Cohesion League" before breaking into two parties "National Unity Party" and "Orange Movement",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i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Odinga. The rise of Odinga power was that he got the benefit from the popular racial politics in Kenya, and he also got help from his reform image and suggestion to establish union with-

in small races— regional united lin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nd unite government in Kenya was due to the huge pressure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abroad. The efforts from the Africa Union and former UN Secretary General Kofi Annan also played key roles. The grand unite government in Kenya will face all problems such as constitutional and land reforms,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interests, it's possible for parties to reach further agreements.

Slavery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Cape Colony before Exploiting "Two Mines"

Sun Hongqi

pp. 58– 63

Since the Netherlander landed on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re had existed a kind of special modern slavery in the Cape Colony until the British found the gold and diamond, as a resul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South Africa Commonwealth brought an end to the system. Because of lack of enough laborers and the extension of colony and growth of animal husbandry, Afrikaners grasp Khoisans and

Bantus as slaves. Of course, the sense of racism from the British incited this profession. Therefore, there were no large scales of plantations like north America, but the modern slave system based on capitalism marketing system took root in Africa, till the second half 19th century, the main laborers were forced to transform to work in mines with the exploiting of diamond and gold mines.